

批判与建构的冲突*

——论阿多诺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格局

李乾坤

内容提要 对阿多诺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格局的考察离不开对批判理论范式的确定。在这一问题上,施威蓬豪伊泽坚持批判理论具有确定的范式,就是以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而哈贝马斯反对批判理论具有特定的范式。对阿多诺“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理性”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构成了坚持经典批判理论方向的两条路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跨学科研究和新马克思阅读,走向主体间性理论方向的交往行为和规范理论路径。哈贝马斯在开阔的理论视野对时代精神做到了准确把握,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他的理论也受到了无法回避的责难。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新马克思阅读 哈贝马斯

以往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的考察中,更多侧重历时性的纵向分期比较,这样的方式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批判理论不同时期所关注的重大主题的变迁,是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范例。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把握方式往往忽略了横向的共时性视角,也就欠缺对批判理论的发展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思想方向和路径的比较。欠缺了这种比较,就无法全面把握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甚至也会忽略掉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思想苗圃中的不少奇珍异草。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战后培养了整整一代学者,这些学者成为德国左翼思想界的中流砥柱,深刻塑造了德国的当代思想版图。如果不能全面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同方向和路径,就很有可能无法对其思想遗产做出恰当的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来就不是完全同质性的,但假如我们将其称作一个学派,就是认同有贯穿其中的作为基础的统一的东西。如何判断阿多诺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格局,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何谓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是否有一个统一的范式?

批判理论有无统一范式?

施威蓬豪伊泽和哈贝马斯的不同答案

格尔哈德·施威蓬豪伊泽^①2012年为著名的《唯物主义历史批判辞典》撰写的“批判理论”词条中,同样为后阿多诺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格局进行了一个划分。在他的划分之中,显然认定批判理论具有一个确定的范式,这个范式,可以从他对批判理论的基本定义之中显现出来:

社会的批判理论是解放的社会哲学,它试图分析和批判19世纪中叶至今的市民的一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的形式,以及理性与合理性的类型,这些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思想运动。它们的共同点是从对价值形式分析中推导出来的,作为商品生产社会基础的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这一理论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指出这种科学对于价值形式的解释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的能力和局限。^②

其实,施威蓬豪伊泽所肯定的批判理论范式就是经典批判理论的范式,也就是由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的《论真理问题》(1935)和《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等文献之中以及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之中确立的范式。^③这一范式的首要特征,就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基,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确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原则。以商品形式分析为根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批判理论范式的统一性的基础。在《论真理问题》一文中,霍克海默就指出:“当今的社会形式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握。从商品的一般概念,可以在纯粹的思想建构中推导出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按照这一理论意图——它毋庸置疑是成功的,对所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认识都可以通过那一原初的认识而被中介得到。”^④这一点,被后来坚持经典批判理论方向的学者所继承,也被作为批判理论第三代的格尔哈德·施威蓬豪伊泽接受和发展。

在阐述了批判理论的基本范式的同时,施威蓬豪伊泽还对批判理论在后阿多诺时代的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新的范式进行了评述,这就是社会的主体间性范式。也就是强调主体的相互间的承认,探讨在劳动和交换关系中存在的自治和相互义务的可能性的条件。就是在这种社会的主体间性之中,新一代批判理论试图在这种内居于社会化之中的互惠原则之上,探讨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这一特征其实是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中所讲的“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理性”的阐发。施威蓬豪伊泽将沿着这条方向的阐释方式划分为三条路径,第一个,就是以20世纪70年代后的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行为理论,这一理论方向贴近于韦伯的社会学方法。哈贝马斯宣告了一种“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向”,力图拯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理性之中的合理性因素。而第二个方向,则是以阿尔弗雷德·罗伦策为代表的,将心理分析理论解释为一种主体间性和社会化理论以及一种反省科学的典型范例。在此之上,罗伦策提出了一种深层诠释学的方法。施威蓬豪伊泽提出的第三个方向,就是霍耐特所开辟的一种经过改良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霍耐特的观点,概而言之就是认为建立在谅解和主体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行为的可能性条件,是将人从特权与不公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形式。^⑤显然,这三个方向具有共同的范式,皆是由哈贝马斯所奠定的。

施威蓬豪伊泽其实是带着批判的态度审视批判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范式转向的。主体与主体间性的理论与规范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施威蓬豪伊泽指出,立足于外在规范的尺度来使批判理论的真理和有效性具有信服力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被霍克海默所否定;阿多诺同样也指出了规范性问题离不开历史的多元维度的分析。脱离了这一点,规范理论很容易退回到黑格尔已经批判

过的二元性之上,也就是事实与决断、认识与价值的二元论之上。因而施威蓬豪伊泽坚持,批判理论应当是对社会自身的批判,是对社会进行特定否定的清晰结构;批判理论应当建立起批判和理论的具体联系。主体间性的范式,也不应放弃对一个社会的总的主体的建构。^⑥所谓社会的总的主体,也就是价值规范与生成价值规范的社会机体的辩证统一。

哈贝马斯曾不止一次指出,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构成体系的东西。这最集中体现在哈贝马斯1984年对批判理论进行回顾时所作的《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史三论》(*Drei Thes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在其中,他非常清楚而直接地指出了批判理论传统内部的这种非统一性。其实哈贝马斯自从进入到法兰克福学派,就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什么堪称体系的批判理论”^⑦。在《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史三论》一文中,哈贝马斯甚至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作为“学派”的合法性问题,认为这一研究传统并没有真正的一致性,然而恰恰这种“虚假的统一性”^⑧成为这一研究传统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点重要原因;而第二点原因,则在于这一研究传统的跨学科性质。而且,重要的是哈贝马斯指出,这种跨学科性在第二代这里也鲜明地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列举了从事于工业社会学的格尔哈德·布兰德,从事于经典唯物主义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从事于分析科学理论的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和赫伯特·施耐德巴赫,以及从事于系统理论的奥菲和从事于结构主义的乌尔里希·厄菲尔曼等等。在第三条纲要中,哈贝马斯更为全面地指出了批判理论这一学派身份的瓦解。哈贝马斯从在他看来已经完全失去范式的批判理论之中归纳了五个发展方向。这五个讨论域分别是:(1)对由“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开启的理性批判的发展延续和对借助于交往理论展开的对理性的拯救;(2)对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的补充和发展;(3)批判社会理论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是在阿多诺去世后重新回到了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思考之上,在此之上开启了对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的研究;(4)对由阿多诺在人格分析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微观的和总体质性的案例分析的方法论思考;(5)对法兰克福学派史的历史学研究,哈贝马斯说,这一研究动向恰恰显示出正统的批判理论研究路径的困境。^⑨

哈贝马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归纳总结,已经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格局。当然,哈贝马斯是倾向于对批判理论的格局做一种“无范式”的解读的,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并未形成明确的范式,到了第二代,同样也没有明确的范式。哈贝

马斯拒绝承认批判理论拥有某种范式,描绘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的客观理论现象,但仅仅是现象。这种态度或许出自哈贝马斯自身的需要,因为否认了这种范式的存在,就为他的路径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和在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上的合法性。

区别于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无范式”解读,我们已经看到了施威蓬豪伊泽所指认的由哈贝马斯奠定的主体间性范式以及对这种范式的批判。如果我们接受哈贝马斯的看法,认为批判理论始终未形成一个确定范式,那么也就无所谓后阿多诺时代的批判理论是否有某种格局存在。但显然,批判理论是有着其确定的范式的。这个范式,就如施威蓬豪伊泽在“批判理论”词条开篇所归纳的,是以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推导出的作为商品生产社会基础的价值规律理论,那么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一个分岔口:

对“内在于交换原则的理性”的不同侧重

在对批判理论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传统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和施威蓬豪伊泽具有重大分歧。而从思想史上看,批判理论两个方向的分岔,更具体地体现在他们对阿多诺一个特定判断的不同理解之上。这就是阿多诺关于交换原则、商品形式的理解所提供的分岔口。《启蒙辩证法》之中,交换原则、商品形式、价值形式,构成了他们对启蒙的批判,对理性传统批判的现实根基。交换原则与商品形式问题贯穿于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基本理解。而这一点,可能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波洛克和霍克海默的影响,一个则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影响。波洛克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深刻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议题,而与之相比我们一直忽略的,是他对马克思货币哲学的研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波洛克通过对马克思一系列“物的现实存在的范畴”,也就是在商品、价值和货币的研究之上,指出了这一系列经济学范畴链接了现实的生产关系和法律以及文化的表现形式。^⑩这一思想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批判理论的基本范式。此外,索恩-雷特尔对阿多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阿多诺关于交换原则和思维形式的关系的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索恩-雷特尔的影响下成型。^⑪

阿多诺曾说,他后来的一切大部头著作都是对《启蒙辩证法》的注脚^⑫,这一点在对交换原则和商品形式问题上同样有所体现,阿多诺1965年出版的《否定辩证法》之中同样也得到了延续。但是,在此时,阿多诺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微妙然而十分关键的转折。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做了这一表述:

如果人们抽象地否定了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为

了不可还原的质的更高的荣誉而断定对等不再是理想的原则,那就是为倒退回古代的不公平寻找借口。自古以来,交换原则的主要特点,是不相等的东西以等价的名义被交换,剩余劳动被无偿占有。假如可比较性作为一个尺度范畴被简单地取消,那么内在于交换原则的理性——当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但也是作为前提——将会让位于直接占有,让位于暴力,在今天就是让位于垄断集团赤裸裸的特权。^⑬

在这段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阿多诺对交换原则的认识已经从前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转向认识到其中有不可丢弃的理性内容。这一点,通过阿多诺去世前写作的一篇《关于批判理论的详尽说明》(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可得到进一步证明。在这份可以称作“关于批判理论的提纲”中,阿多诺清楚地道出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批判了斯大林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性,并且强调了交换原则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份提纲中,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关系时,阿多诺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意思是,它并不进行假设,并不是简单成为哲学。哲学的问题是开放的,而非通过世界观被预先决定的。”^⑭此外,在论述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理论的特征时,阿多诺从物质需要的满足的角度论述了解放的图景,而这种解放,正是在超越“某种”交换原则之上实现的:“超越某种交换原则意味着同时实现它:任何人都不允许得到的比平均社会劳动的等价物还要少。”^⑮为何出现了这种转折呢?阿多诺开始意识到交换原则中蕴含的理性因素的重要性,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也就是在苏共二十大当斯大林主义的弊病完全暴露出来之后。阿多诺认识到,交换原则作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性原则是同一性强制的根本逻辑,是应被批判的;但如果完全否定了它,则将其中蕴含的积极的内容,如平等、自由同样也否定掉了。

商品形式和交换原则,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强制与“被管理的社会”的隐性真实结构的来源,是阶级压迫的来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总体性的现实根据;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商品形式和交换原则之中,还蕴含了理性的内容,即平等和自由的依据。其实交换原则、等价形式是资产阶级平等和自由的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之中也早已指出。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中,马克思明确在交换的经济形式之上探讨了自由和平等的来源:“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流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以一切平等和自

由产生的、现实的基础。”^⑩《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⑪当然,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平等、自由是建立在商品交换之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证据表明马克思因此就拒绝了这种平等和自由的形式。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而这种平等和自由的形式,应该就属于马克思所接受和承认的部分。这种平等和自由,正是阿多诺在50年代后半期之后所意识到的不可扬弃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将交换原则和等价形式全盘否定,那么起码的平等自由也将会被抛弃,所带来的将会是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赤裸裸的特权和压迫。

然而也就是交换原则和等价形式之上所蕴含的这种尖锐的矛盾性,构成了后阿多诺时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岔口。

阿多诺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两个方向和三条路径

可以说,对阿多诺“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理性”这一判断的两个不同侧重,直接构成了后阿多诺时代批判理论发展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在这条分岔口上,一批学者继续向左走,继续着对商品生产社会的社会形式、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批判;而另一批学者则向右走,试图拯救交换原则之上的理性内容,在交往理论、社会心理、承认理论等理论层面上建立起克服不公与压迫的可能性空间。这两个方向截然对立。所以,我们可以将后阿多诺时代的批判理论格局,依照对阿多诺“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理性”的不同阐发划分为左和右两个方向。在左的方向上,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条路径。其一是坚持经典批判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的路径;其二是专注于经典批判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也就是新马克思阅读理论运动。

路径一:坚持经典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跨学科研究的路径

继续坚持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开辟的经典批判理论范式,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基,在此之上展开跨学科研究的路径。这条路径其实是后阿多诺时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以海尔曼·施威蓬豪伊泽(1928~2015)、阿尔弗雷德·施密特(1931~2012)、格尔哈德·布兰德(1928~1987)、罗尔夫·蒂德曼(1932~)、奥斯卡·内格特(1934~)、于尔根·李策特(1935~)、郝伯特·施耐德巴赫(1936~)、雷吉娜·贝克·施密特(1937~)、狄特·普罗科普(1941~)、德特勒

夫·克劳森(1948~)、克里斯多夫·蒂尔克(1948~)、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1952~)、格尔哈德·施威蓬豪伊泽(1960~)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这一理论分支更为忠实地沿着经典批判理论,特别是沿着阿多诺的经典批判理论所奠定的基本方向和未竟事业前进,在哲学、社会理论、文化工业、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理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路径在德语学界的批判理论领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便在今天,也是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他们以《批判理论杂志》为平台,每年召开“批判理论研究学园”研讨会,召集并继续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必须承认的是,我国学界以往对这一路径的了解和研究相对有限,然而这一路径的思想资源却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在以上列举的这些思想家和学者中,很多都对批判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批学者的努力,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经典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也不会在今日德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如海尔曼·施威蓬豪伊泽,作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大弟子,在坚守经典批判理论的范式之上,在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和美学理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我国学者对他的研究了解的相对较多,他在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做出了持久的探索,晚年还转向对叔本华的研究。施密特在整理发表、阐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期的批判理论文献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奥斯卡·内格特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在德国左翼学界影响巨大,于尔根·李策特则在辩证法思想研究上著作颇丰。可以说,这一路径是批判理论研究中绝对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今天,我们需要对之加以重视。但是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路径因其坚定的左翼立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德国学术界不断受到挤压,外在地看,这一方向上的学者,大多已就职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之外的高校和机构之中,然而这客观上也使得他们所坚持的经典批判理论路径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此外,这一路径对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方向持坚定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尤其以1989年出版的《非批判理论:反哈贝马斯》(*Unkritische Theorie, Gegen Habermas*)这一批判文集为代表。

路径二:新马克思阅读路径

同处经典批判理论方向之上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为纯粹的,就是新马克思阅读这一理论运动。^⑫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从作为奠基人的阿多诺的两位学生巴克豪斯(1929~)和莱希尔特(1939~),到国家衍生论争的参与者,一直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代表人物,都给予哈贝马斯代表的方向以尖锐的批判。国家衍生论争的一个重要批判对象就是以哈贝马斯和奥菲为代

表的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巴克豪斯始终带着感性和理性嘲讽、批判哈贝马斯表现出的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屑。但是,我们不得不带着遗憾承认这一事实,就是这一路径之中的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就日渐被排挤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边缘,巴克豪斯因其慢吞吞的写作速度和固执的性格,几十年来始终是一名讲师;莱希尔特后来任职于不莱梅大学,而在他们影响下的学者,如国家衍生论争的参与者们,也大多处于德国主流学术界的边缘。他们与前述的坚守经典批判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路径的学者关系尚密切,但他们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仅保存了思想上的继承,而很少有学术活动或组织上的联系。但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马克思阅读这一路径却在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复兴,不论在德语学界还是在英语学界,近年来都有愈来愈多的学者转向关注这一思想路径,英国“历史唯物主义”书系近年来也开始组织翻译这一路径的文献和相关研究。这其中的原因为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路径三: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理论路径

另一个向右的方向,当然是在世人看来最名正言顺的哈贝马斯、霍耐特所代表的方向,这一方向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印玺,他们作为批判理论的继承人在名和实上似乎都不容置疑。这个方向和路径,在前文施威蓬豪伊泽的归纳中已经提及。这个方向回避甚至拒绝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分析,这一点,哈贝马斯很早就和阿多诺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哈贝马斯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当他(阿多诺)认为自己第一次对确认思维和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有了确切明晰的认识之后,他就过来告诉了我。而我恰好在这点上保留看法,顺便提一下,我们当时展开了讨论,尽管我深知在这些问题上我并未给阿多诺留下任何印象。”^⑩这一方向对理性的拯救、规范基础的奠基以及平等和自由的捍卫,在理论上是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奠基的。在这个意义上,交换原则、等价形式被替换为了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整合近现代西方乃至英美的分析哲学、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在规范伦理、政治理论方向做出了重要的探索。这一方向,已经被人冠上“新批判理论”的名号。其中的代表人物,除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之外,还有洛伦策(1922~2002)、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1933~)、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1922~2010)、克劳斯·奥菲(1940~)、乌尔里希·厄菲尔曼(1940~)、莱纳·福斯特(1964~)等一批学者。但正如我国学界很早已经认识到的,这一理论分支早已告别了左派的立场,全面右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谋者和捍卫者——这一点,也成为德国左翼思想界的广泛共识。

通过这样两个方向三个路径的考察,我们得到了对后阿多诺时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个全景式的审视。当然,这三个路径的划分绝非一刀切式的泾渭分明,一些学者如克里斯多夫·蒙克(1958~)和拉尔·耶吉(1967~),就处于经典批判理论路径和哈贝马斯、霍耐特的路径之间;而另一些学者如罗尔夫·魏格豪斯(1944~),就转向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史的专门研究,也难以列入这三条路径之中。但通过这两个方向、三条路径的考察,可以起码得出这样的结论:后阿多诺时代的批判理论的格局远为复杂得多,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方向并不能完全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或者说如果以他作为最主要的代表会遮蔽甚至扭曲后阿多诺时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忽略大量对于我们弥足珍贵的德国当代左翼思想资源。尽管如此,由哈贝马斯所开启的路径,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理论事实,这条路径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而另一个方向上的两条路径却久久处于压抑之中,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索进行一个批判性考察。

对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方向的反思

哈贝马斯是理解把握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的过程中绕不过的一座大山。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树的审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参照,为我们把握和反思德国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帮助。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推进和发展有两点至关重要的特征。第一点,就是他能够以开阔的视域吸收批判理论传统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思想资源;第二点,则是他更为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对于理论的需要。

由于哈贝马斯自身特殊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他对左右翼的思想资源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并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科学”,一切理论资源都是可以拿来用的。他接受了美国的社会学和分析哲学,这一点就使他具备了和德国思辨传统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些是哈贝马斯能够集现代理论百家之长,创造出宏大理论体系的方法前提。大体讲来,通过以“普遍语用学”为前提的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规范的基础,引入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资源,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纳入到更为全面的现代性议题之中,这几个方面是哈贝马斯对经典批判理论最为重要的发展和推进。这三个方面,是建立在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系统”(System)的二元主义划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二元主义划分,所表现出的正是他对现代社会最新发展的认识。这就是,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劳动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之后,一种人与人的交往、交谈、对话、商谈的领域就凸显

了出来,哈贝马斯借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来描述这一公共领域的景象。也就是在这种生活世界之上,交往行为理论获得了现实的基础。而“系统”则集中体现了韦伯意义上的“事务化”(Versachlichung)的内涵,也就是为保障社会生产而必然需要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系统。而在晚期资本主义之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支配愈发严重,就会带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也就是现代性的危机。而为了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重新回到了交往行为中的“理解”与“共识”之上。^②

哈贝马斯在批判理论上的巨大推进和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体现在他更能够把握住时代精神的动向。哈贝马斯是一名更能够看透时局,懂得用时代主流所能接受的语言讲话的思想家。关于这一点,莱希尔特就曾讲过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已故的朋友——海因茨·布拉克迈耶尔曾经给我讲过他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一个非常私人的交谈。哈贝马斯跟他说,人们必须按照能够在《时代周报》(当时还是一份严肃的左翼自由主义报纸)上发表的标准来写作。当时的《法兰克福评论报》已经被认为太左了,这会阻碍在大学的职业发展。”^③不管怎样,识时务者为俊杰,哈贝马斯之所以取代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等人,超出其他传统批判理论范式的坚守者甚远,就在于他的理论建构同时满足了德国左派和右派的基本要求。哈贝马斯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又绝不提出任何带有激进色彩的解决方案,左右逢源,顺应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德国的意识形态需要,他能成为德国的官方哲学家,原因就在于此。相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学生和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哈贝马斯更多地是采取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福利国家基本建立、民主宪政得以推行的德国,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深刻变化,这就是“生活世界”的形成,并在此之上,提出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对哈贝马斯的批判并非新鲜事。福柯对其交往理论是一种“交往乌托邦”的责难,就在左翼思想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哈贝马斯的理论弱点显而易见,建立交往理性来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愿景,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片面的意识形态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立,绝不会通过对话与商谈达成化解,相互理解并不等同于达成共识。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沿着批判理论路径的左的方向前进的学者,包括新马克思阅读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恰恰聚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哈贝马斯不懂也不想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条方向上的学者集中开火的地方。新马克思阅读对哈贝马斯及其路径所进行的批判是持久而坚决的。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一再指出,哈

贝马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表现出了彻底的无视态度,他在经济学的理解上停留在早期的琼·罗宾逊和早期熊彼特之上。^④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忽视,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上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穆勒和克里斯特尔早在1970年的《福利国家幻象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一文中,就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哈贝马斯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一样,割裂了生产和分配的关联,从而也割裂了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在政治上否定了革命的可能,而转向社会改良,并诉求基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多元民主。对于多元民主的认可,其实也正是哈贝马斯后来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民主理论的前提。然而,“多元主义恰恰就是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⑤。割裂了生产与分配,也便无视了生产之中不可避免的劳资矛盾,而将注意力放在对政治意愿的塑造之上。

由盖尔哈德·鲍尔特主编的《非批判理论:反哈贝马斯》文集,集中了七篇文章,较为有力地对哈贝马斯进行了批判。这几篇文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我们择选其中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立足点的文章进行考察。鲍尔特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对哈贝马斯猛烈开火。在鲍尔特看来,哈贝马斯背弃了批判理论的纲领,离开了需要根本变革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也离开了“作为主体的社会的观念”。而这些理论立场导致了哈贝马斯的深层谬误,鲍尔特指出:“因为他不想简单地承认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化的剥削关系,他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审视资本主义,而是仅仅从联邦德国这一橱窗来审视资本主义,在这里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富足、社会安定、自由、权利保障、民主。”^⑥鲍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哈贝马斯的问题所在,他的理论所立足的社会,不过是联邦德国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橱窗而已,缺乏全球化视域,看不到这些现代性的华丽展品的片面性。因此,博尔特说,哈贝马斯的“现代项目”和“西方文明”的傲慢的空话后面隐藏着一种狭隘的地方性,即将联邦德国这一典范作为科学尊严的来源,仅仅看到了联邦德国的富足和自由,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肮脏的也更为广阔边缘地带。^⑦正因为哈贝马斯无法忍受也无法辩证地把握现代社会在物质上思想上的潜力和它真实的样子之间的张力,他取消了批判理论的历史纲领,转向寻找规范性的替代手段,逃往了交往理论和实证的伦理学。这堪称直戳要害的批判。

在罗尔夫·约翰内斯的《论被哈贝马斯分离为系统的世界》一文中,同样也对哈贝马斯的“系统”的内在矛盾性进行了批判考察。约翰内斯指出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和经济、国家子系统之间的分离,建立在晚期资本主义劳

动与闲暇的分离之上。^{②⑥}生产力的进步、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为闲暇与交往提供了前提,也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正因此,约翰内斯也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把握的,社会实践首先是劳动的过程,没有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没有了交往、政治、艺术与闲暇;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一个不同环节共同构成的整体,但是,它是建立在暴力和矛盾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上的虚假的整体。然而哈贝马斯对社会再生产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概念是保持怀疑的,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他,将劳动实质理解为“在根本上独白式的”被把握的“策略行为”的游戏方式,将其制定为一个与语言相对立的行为方式,将劳动和语言设定在同等的地位之上,从而也将社会划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对立。但是,这种划分显然丢掉了历史的维度,没有看到以交往活动为主的生活世界恰恰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多之上,更不会看到劳动、生产和再生产对于语言所代表的交往行为领域的决定性作用。约翰内斯还指出,在哈贝马斯的理解中,货币仅仅是“税收的中介”,而货币这一表现形式背后隐藏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性原则的价值的增殖,也消失在哈贝马斯的视野里。^{②⑦}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哈贝马斯进行的批判,也就是在阿多诺“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理性”这一思考上继续沿着经典批判理论向左走的批判理论路径对其进行进行的批判。正是因为将视角聚焦在商品形式和资本逻辑的基本问题之上,这一批判恰恰直击哈贝马斯的要害,这个问题其实是他无法也没有能力回应的。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后阿多诺时期批判理论的激进路径,通过对哈贝马斯所代表的路径的批判,更为深刻地挖掘出了批判理论的真正内核,这就是对商品生产社会之中的价值规律基础以及在此之上的价值形式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这正是由新马克思阅读所揭示的。只有在这一路径之上,才能坚守批判的指向,而非为其寻找合法性依据。因为价值形式背后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只要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仍占据主导,就无从根本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化外表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或许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暂时掩盖了这些矛盾,但是,正如当今涌入德国的难民让另一个世界展现在德国人面前一样,那个真实的世界,或早或晚,总是欢迎着你的到来。

①格尔德·施威蓬豪伊泽(Gerhard Schweppenhäuser),1960年出生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现于维尔茨堡-施韦因富特科技大学任教授,是当今德国批判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从事批判美学研究,《批判理论杂志》(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Theorie)主编。其代表作之一《阿多诺导论》已经翻译成中文。他的父亲,是著名批判理论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第一位学生海尔曼·施威蓬豪伊泽(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 ②⑤⑥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Kritische Theorie, in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HKWM)*, Bd. 8/1, 2012, S. 197~200, S. 212~215, S. 217~218.
- ③关于《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问题,可参见李乾坤《理性自我否定的现实根源:析〈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求是学刊》2016年第3期。
- ④Marx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Folge. 4, 1935, Nachdruck: München 1980, S. 351.
- ⑦[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赵文、刘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6页。
- ⑧⑨Jürgen Habermas: Drei Thes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Hrsg. von A. Honneth,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Folgen*, Berlin 1986, S. 8, S. 11~12.
- ⑩Friedrich Pollock, Zur Marx'schen Geldtheorie,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Jg. 13, Hrsg. von Carl Grünberg, Leipzig 1928, S. 195.
- ⑪[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 ⑫[德]施威蓬豪伊泽:《阿多诺》,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 ⑬[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44页。
- ⑭⑮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1969. In: Walter Benjamin Archiv, Berlin.
-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 ⑱关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可参考中文文献有李乾坤《“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一种新纲领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意]R. 贝洛菲尔、T. R. 瑞瓦《新马克思阅读——复归政治经济学批判于社会批判之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6期;李乾坤《“新马克思阅读”的当代书写:英格·埃尔贝访谈》,《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 ⑲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东安、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 ⑳在这里,哈贝马斯实际上向人们提供了两个层面的生活世界,一个作为超验的、普通语用学意义上的,由符号和语言世界构成的生活世界;一个则是经验层面的现实生活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试图用超验的生活世界克服经验的被殖民的生活世界。
- ㉑援引自笔者与莱希希特的访谈(2016年2月23日,不莱梅)。
- ㉒Hans-Georg Backhaus: Die Anfänge der neuen Marx-Lektüre, in: *Dialektik der Wertform*, Freiburg: Ca ira-Verlag, 1997.
- ㉓E. Fraenkel: Strukturanalyse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1969, 12. 6, S. 13. 转引自: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 25.
- ㉔②⑤⑥⑦Hrsg. von Gerhard Bolte, *Unkritische Theorie, Gegen Habermas*, Lüneburg 1989, S. 9, S. 9, S. 40, S. 55.

作者简介:李乾坤,1987年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涛]